

后2020时期农户相对贫困测度及机理分析 ——以重庆市长寿区为例

刘愿理¹, 廖和平^{1,2*}, 李靖³, 李涛¹, 蔡进⁴, 何田¹

(1. 西南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重庆 400715; 2. 西南大学精准扶贫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 重庆 400715;
3. 西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四川 绵阳 621000; 4. 重庆工商大学旅游与国土资源学院, 重庆 400067)

摘要:研究中国相对贫困问题将会为后2020时期建立解决农村相对贫困长效机制提供理论参考。因此, 论文以农户为研究对象, 系统分析了后2020时期相对贫困的新内涵和新特点, 尝试构建相对贫困测度评价指标体系, 基于多维视角划定相对贫困线, 并以重庆市长寿区为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 ①相对贫困指数法具有一定的科学性, 基于多维贫困视角, 能够全面反映或量化人口实际生活状况的需求; ②相对贫困人口在提高生活质量、提升自身能力和获得发展的机会等方面较少, 主要源于产业带动作用较弱, 参与合作社发展和劳动技能培训的机会较少, 户主教育水平较低, 且超过1/3的相对贫困户属于老人户、残疾户和重病户; ③扶贫政策、经济基础、社会保障和个人条件是影响相对贫困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 相对贫困; 机理分析; 农户; 测度; 后2020时期; 重庆

贫困一直是困扰发展中国家的难题, 更是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政府大规模开展了扶贫开发工作, 经历了从农村扶贫(1978—1985年)、开发式扶贫(1986—2000年)、全面扶贫(2001—2012年)和精准扶贫(2013年至今)4个阶段^[1]。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党中央围绕脱贫攻坚做出了一系列重大部署和安排, 全面打响脱贫攻坚战, 成效显著, 中国贫困人口从2012年的9899万人下降至2019年的551万人, 为世界贫困事业贡献了中国力量, 创造了世界减贫奇迹^[2-3]。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 确保到2020年中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 意味着2020年后中国将历史性地解决贫困问题, 消除绝对贫困。但2020年后, 由于城乡发展不平衡、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异化和特殊人群内生动力不足等问题还未有效解决, 相对贫困

问题将成为阻碍社会经济进步与社会稳定的关键要素^[4], 贫困人口的发展、能力、共享和权利等问题日益显现, 中国农村扶贫工作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近年来, 贫困问题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学者们围绕贫困的测度、影响因素、空间格局、发生机制、减贫措施及脱贫效果等开展了大量研究, 成果丰硕^[5-8]。然而, 目前关于中国后2020年时期如何治理相对贫困和建立解决相对贫困长效机制等问题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 相关文献较少。现有研究认为, 后2020时期的贫困问题将由集中式减贫治理战略转向常规性减贫治理战略, 农村贫困转向城乡贫困并存, 收入贫困转向多维贫困, 国内贫困转向国内减贫与国际减贫合作相结合^[9-11]。扶贫工作内容也将重点关注和解决因城乡二元结构、城乡基本

收稿日期: 2019-12-30; 修订日期: 2020-03-12。

基金项目: 西南科技大学科研基金资助项目(19sx7106); 重庆市教委科学技术研究项目(KJQN201900834); 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博士项目(2018BS86)。[Foundation: Science Foundation of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o. 19sx7106;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earch Project of Chongqing Municipal Education Commission, No. KJQN201900834; Chongqing Social Science Planning Doctoral Program, No. 2018BS86.]

第一作者简介: 刘愿理(1987—), 男, 博士生, 研究方向为国土资源与区域发展、乡村贫困治理。E-mail: 402952363@qq.com

*通信作者简介: 廖和平(1964—), 女, 教授, 博导, 研究方向为土地规划与管理。E-mail: liaohp@swu.edu.cn

引用格式: 刘愿理, 廖和平, 李靖, 等. 后2020时期农户相对贫困测度及机理分析: 以重庆市长寿区为例 [J]. 地理科学进展, 2020, 39(6): 960-971. [Liu Yuanli, Liao Heping, Li Jing, et al. Measurement and mechanism analysis of relative poverty of farming households in the post-2020 period: A case study of Changshou District, Chongqing Municipality.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20, 39(6): 960-971.]
DOI: 10.18306/dlkxjz.2020.06.007

公共服务差异化产生的贫困人口平等的发展机会和能力提升等问题^[12-13]。针对后 2020 时期贫困问题出现的变化和特点,学术界认为需要尽快建立相对贫困标准,划定相对贫困线,构建多维评价指标体系^[14-15],重点关注留守群体、儿童健康状况、农民工及失地农民等特殊人群^[16],提高教育水平,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17-18],做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扶贫开发政策衔接,分类实施兜底保障式扶贫^[19],以区域政策、精准滴灌式扶贫、产业可持续发展、文化软实力建设和城乡一体化扶贫体系等方法解决相对贫困问题^[20]。与此同时,部分学者对相对贫困进行了定量分析,运用 Logit 模型分析相对贫困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利用 BP 神经网络模型模拟中国县域农村贫困的空间格局,识别 2020 年后仍需国家政策倾斜的帮扶县^[21-22]。

纵观现有研究成果,学者们总结了后 2020 时期贫困的新特点和新变化,指明了下一阶段减贫工作的方向,从宏观角度提出了相对贫困治理的措施。但是,相关研究至少在以下 3 个方面存在拓展空间:一是未能系统阐述下一阶段相对贫困的内涵和特点;二是相对贫困的标准划定仍停留在收入单一维度,未能考虑贫困人口的发展机会和能力提升等问题;三是没有构建多维度的相对贫困评价指标体系。鉴于此,本文在梳理和总结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拓展相对贫困的概念和内涵,从多维度的视角尝试划定相对贫困线,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并进行实证分析,以期为后 2020 时期建立解决农村相对贫困长效机制提供理论参考。

1 相对贫困的科学认知

1.1 概念及内涵

贫困是一个程度性的概念,不同角度有不同的理解。从经济学的视角看,贫困通常简化为 2 种形式,即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二者主要的区别在于贫困人口的确切方法,并在内涵特征、制度设计、入贫风险和标准侧重等方面存在逻辑关系,并根据其关系制作图 1。如图所示,图形中的横轴为生活水平(x),自左向右则表征生活水平逐渐提升,横坐标上的 2 个节点($x=x_1$ 和 $x=x_2$)划分出 3 个区间,分别表征绝对贫困($-\infty, x_1$]、相对贫困(x_1, x_2] 及非贫困($x_2, +\infty$)。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属于并列对应关系,分别代表生存状态和生活状态。

理论层面: 绝对贫困	相对贫困	非贫困
内涵特征: 生存型贫困	发展型贫困	无贫困
x_1	x_2	生活水平 x
标准: 实现“两不愁、三保障”	实现全面发展	实现共同富裕
入贫风险: 已贫困	高风险	无风险
特征: 绝对性、不平等性	相对性、脆弱性、受阻性、匮乏性、不平等性	共同富裕
制度设计: 精准式扶贫	精细化救助	平等共享
标准侧重:		
◆① 稳定收入低于绝对贫困线	◆① 稳定收入超过绝对贫困线,但低于社会平均水平	◆① 稳定收入大于社会平均水平
◆② 未实现“两不愁、三保障”	◆② 实现“两不愁三保障”但有负担	◆② 实现“两不愁、三保障”无负担
◆③ 提升生活水平的能力严重不足	◆③ 提升生活水平的能力不足	◆③ 具备足够提升生活水平的能力

图 1 相对贫困与绝对贫困的逻辑关系

Fig.1 Log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absolute poverty and relative poverty

英国学者 Townsend^[23]于 1971 年提出了相对贫困理论,认为贫困不只是生活的需求得不到满足,还包括无法吃得好、穿得好和住得好,不能获得平等的发展机会,可行能力受到限制,从而达不到社会公认的基本生活水平。为此,本文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多维度的视角重新梳理和界定了相对贫困的概念和内涵,认为相对贫困是指由于城乡发展不平衡、基本公共服务差异化等导致家庭或个人拥有的收入、资源、能力、发展机会和社会保障等明显低于社会平均水平的一种生活状态,表征为贫困人口不能充分融入社会,自身能力、发展机会、享受同等权利等方面受到阻碍,属于发展型贫困范畴。相对贫困具有相对性、脆弱性、受阻性、匮乏性和不平等性的特点,其内涵包括 5 个方面:一是物质资源的相对性,反映贫困人口在同等社会经济环境条件下,拥有的物质条件状况,用“吃得好、穿得好和住得好”表征,属于自然属性;二是经济条件的脆弱性,反映贫困人口应对家庭的意外支出能力不够稳定,拥有的经济条件具有明显的脆弱性,用家庭收入及其稳定性和产业发展水平表征;三是可行能力的受阻性,反映贫困人口自身具备的能力和获得提升的机会较少,具备的能力处于相对阻碍状态,用劳动力数量、健康状况和受教育程度表征,是相对贫困的内因;四是发展机会的匮乏性,反映相对贫困人口获得的就业、创业等机会较少,用技能培训、金融支持、转移就业等表征,是相对贫困的外因;五是社会保障的不平等性,由于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异化,导致一部分人不能平等地享受医疗、保险、公共服务等资源,用教育条件、就医条件和医疗保险表征。

1.2 相对贫困标准界定

后2020年时期,相对贫困的标准制定将成为贫困治理工作的重点任务^[24],新的贫困标准需要根据国际经验和国内情况,与现阶段反贫困成果和社会发展目标衔接^[25]。目前,国内外学者界定相对贫困标准的方法较为单一,主要依据收入比例划定,如农村居民中位数收入的40%、收入的40%~50%、平均收入的百分比、分位数的百分比和几何平均法等^[26-27],但也有学者对使用平均数或中位数划定相对贫困线提出了质疑,认为以收入作为相对贫困线的划定,虽然简单易操作,但不能适应后2020时期相对贫困的特点,更不能全面准确地识别贫困人口,存在一定的缺陷^[28]。

与此同此,部分学者认为相对贫困的标准划定,应该围绕人的全面发展目标建立多维度的发展型贫困标准^[29],提出利用多维贫困识别和测度作为相对贫困和制定多维减贫政策的标准,对多维度指标进行定量分配^[30-31],从而解决贫困人口个体发展能力和发展机会等问题。从国际经验来看,欧盟国家重新划定了社会贫富标准,将应对家庭意外支出能力,是否吃得好、住得好、穿得好,是否拥有车辆等13项指标纳入考核指标,只要有5项不达标就列为相对贫困^[32];哥伦比亚、巴西、墨西哥等部分拉美国家相对贫困线的划定综合考虑了收入、教育、就业等维度,从而确保贫困人口充分融入社会,公平

享受同等权利^[33];同时,Booyesen等^[34]采用资产指数对贫困状态进行测度,并采用资产指数分布的40分位和60分位作为资产贫困的相对指标,对撒哈拉以南非洲7个国家的贫困状态进行测度。

鉴于此,本文结合国内外学者对相对贫困线界定的观点,依据多维贫困理论,探索性地从物质资源、经济基础、可行能力、发展机会和社会保障5个维度采取相对贫困指数法划定相对贫困线,即将5个维度的各项指标定量处理,测算农户的相对贫困指数,并以指数中位数的70%作为相对贫困线。

1.3 农户相对贫困测度指标体系构建

在相对贫困概念与内涵的基础上,基于多维度贫困理论,结合数据的获取性,构建由物质资源、经济条件、可行能力、发展机会和社会保障5个子系统组成的农户相对贫困测度指标体系(表1)。

(1) 物质资源子系统。该系统反映贫困人口在同等社会经济环境条件下拥有的物质条件状况,是测算相对贫困的基础,属于自然属性。主要选取了衣食无忧、饮用水来源和住房质量3个指标,表征“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和饮水安全有保障。

(2) 经济条件子系统。该系统说明相对贫困人口拥有的经济条件、稳定性及其能否应对家庭的意外产生的支出,决定是否陷入相对贫困的关键性因素,属于社会属性。包括家庭人均纯收入、产业发展效果和转移性收入占比3个指标,其中前2个指

表1 农户相对贫困测度评价指标体系

Tab.1 Relative poverty measurement indicator system for farming households

维度	权重	指标	指标阐释及赋值	主观权重	客观权重	组合权重
物质资源	0.15	衣食无忧	吃好穿好表征:经常=3,有时=2,偶尔=1	0.35	0.36	0.36
		饮用水来源	自来水=4,深井水=3,泉水/河水=2,其他=1	0.31	0.31	0.31
		住房质量	砖混房=3,砖瓦或砖木房=2,土木房=1	0.34	0.33	0.33
经济条件	0.23	产业发展效果	效果好=3,效果一般=2,没有效果/发展失败=1	0.31	0.31	0.31
		家庭人均纯收入	家庭纯收入/家庭人口	0.40	0.41	0.41
		转移性收入占比	政府补贴、亲友补助等收入/总收入	0.29	0.28	0.28
可行能力	0.22	户主受教育程度	本科(大专)=4,高中或中专=3,初中=2,小学以下=1	0.31	0.29	0.30
		劳动力人数	16~60周岁(除学生外)有劳动能力人数	0.35	0.36	0.35
		健康状况	良好=4,慢病/三四级残疾=3,大病=2,一二级残疾/精神病=1	0.34	0.35	0.35
发展机会	0.21	政策性贷款支持	有=2,无=1	0.24	0.24	0.24
		劳动技能培训	未参加=1,培训时间1周以下=2,培训时间1周以上=3	0.26	0.27	0.26
		参加合作社生产经营	未参加=1,参加=2	0.22	0.20	0.21
社会保障	0.19	劳动力转移就业占比	劳动力转移就业人口/劳动力总人口	0.28	0.29	0.29
		看病条件	非常方便=3,方便=2,不方便=1	0.39	0.40	0.39
		医疗保险及救助	合作医疗=4,大病保险=3,大病或慢性病救助=2,其他保险=1	0.26	0.25	0.26
		教育条件	非常方便=3,方便=2,不方便=1	0.33	0.35	0.35

标直接反映家庭具备的经济能力,后一个指标说明家庭收入是否具备可持续性。

(3) 可行能力子系统。该系统反映贫困人口自身具备的能力和获得提升的机会,是相对贫困的内因。可行能力决定农户自身是否有能力发展生产,自力更生、脱贫致富。因此本文选取了户主受教育程度、劳动力人数和健康状况3个指标。

(4) 发展机会子系统。该系统表征相对贫困人口获得的就业、创业等发展机会,是相对贫困的外因。外部环境和国家政策的倾向更能为农户的生产生活提供机会,让贫困人口摆脱相对贫困,早日实现小康。本文主要选取了政策性贷款支持、劳动技能培训、参加合作社生产经营和劳动力转移就业占比4个指标。

(5) 社会保障子系统。该系统反映农户平等享受医疗、保险、公共服务等资源的权利,主要包括就医看病条件、医疗保险及救助和教育条件。其中就医看病指标反映了家庭成员医疗服务的水平,医疗保险及救助指标反映家庭是否购买农村新型合作医疗保险、商业保险、大病保险等,教育条件反映义务教育阶段的适龄儿童上学条件是否方便。

2 实证研究

2.1 研究区概况

长寿区地处重庆市腹心,襟长江而临主城。介于106°49'~107°27'E、29°43'~30°12'N之间,地跨长江南北,东南接壤涪陵区,西南与渝北区、巴南区为邻,东北接垫江县,西北与四川省邻水县相接(图2)。截至2018年底,全区幅员面积1424 km²,辖19个乡镇(街道)222个行政村,常住人口85.5万人,其中农村居民50.5万人。全区经济发展较快,地区生产总值597.5亿元,同比增长6.2%;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571元,位居重庆市各区县中上游(13位);是全市有名的工业制造基地和产粮大区。长寿区作为重庆市贫困非重点区县,有10个市级贫困村,已于2015年全部脱贫摘帽,6512户17831人贫困人口已脱贫出列,绝对贫困基本消除,但因为地理位置、资源禀赋和城乡二元结构等因素,全区贫富差距较大,相对贫困问题逐渐突出。因此,本文以长寿区为例,测算其相对贫困值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2.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2.1 研究方法

(1) 相对贫困测度模型

本文从单一收入维度转向自然、经济、能力、机会和社会等多维度测算,利用相对贫困测度模型,求得研究区相对贫困指数RPI。计算公式如下:

$$RPI = \sum_{i=1}^n \left(\sum_{j=1}^m F_{ij} W_{ij} \right) W_i \quad (1)$$

式中:*n*为维度个数;*m*为相应维度下的指标个数;*F_{ij}*为标准化后的指标值;*W_{ij}*为指标权重;*W_i*为维度权重。

同时,为了厘清抽样农户相对贫困指数的分布,本文运用Kernel核密度估计方法对其进行分析。

(2)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属于统计学范畴,是用于分析一个因变量和多个自变量之间的函数线性关系。因此,本文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探索研究区抽样农户相对贫困与影响因素之间的依存关系。多元线性回归方程的一般形式如下:

$$Y = \beta_0 + \beta_1 X_1 + \beta_2 X_2 + \dots + \beta_j X_j + \dots + \beta_k X_k + \mu \quad (2)$$

式中:*k*为自变量个数;*β_j*为回归系数;*μ*为随机误差项。使用之前需要对方程进行拟合优度检验、方程总体线性显著性检验和变量显著性检验。

(3) 数据标准化处理

本文选取的评价指标具有不同的量纲,既有正向指标,又有负向指标^[35]。因此,本文采用极差标准化法对各项评价指标的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其表达式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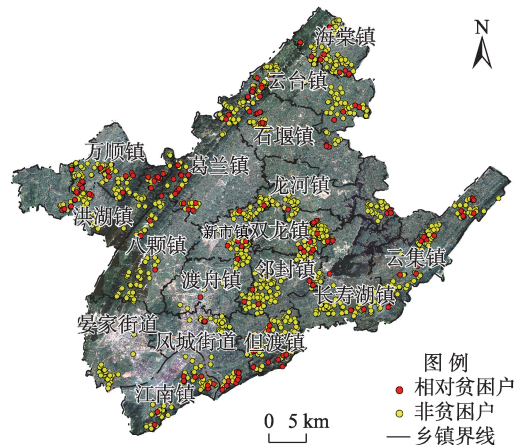


图2 研究区抽样分布

Fig.2 Survey sample distribution in the study area

$$\text{正向指标: } Y_{ij} = \frac{X_{ij} - X_{j\min}}{X_{j\max} - X_{j\min}} \quad (3)$$

$$\text{负向指标: } Y_{ij} = \frac{X_{j\max} - X_{ij}}{X_{j\max} - X_{j\min}} \quad (4)$$

式中: Y_{ij} 为标准化处理后的指标值, X_{ij} 为长寿区第 i 个农户第 j 项评价指标的原始数据, $X_{j\max}$ 、 $X_{j\min}$ 分别为第 j 项评价指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4) 指标权重确定方法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指标权重的确定主要有主观赋权法和客观赋权法,二者各有利弊。因此,本文结合2种指标权重方法,依据博弈论思想,克服主观权重主观性较强、客观权重未能考虑决策者意愿的缺点,以Nash均衡作为协调目标,构建可能权重集,寻找最优组合,以期确定一个最能接近实际情况的权重值,以真实反映指标对评价对象的贡献。

2.2.2 数据来源与样本特征

(1) 数据来源

本文借鉴已有研究思路^[36],按照“区抽村、村抽户”的多阶段抽样方法,对研究区开展了实地调查。调查方式为资料收集、问卷调查和半结构式访谈,最终按照既定方案抽取了2000户样本量,有效

样本量1785户,有效率达到89.25%。调研内容主要涉及农户物质保障、经济发展、发展机会、可行能力和社会保障等基础信息。

(2) 样本特征

由表2可知,非贫困户(924户)样本量略高于脱贫户(861户),受访农户主要以男性为主,占总样本量的81.34%。从年龄结构来看,受访农户主要集中在61岁以上,共1108户,占样本量的62.07%,表明受访农户家中主要以中老年人居多;从家庭纯收入来看,家庭人均年纯收入主要分布在3501~10000元之间,共计1071户,占样本量的60.00%,其中非贫困户中有1户年收入低于3500元,但不低于绝对贫困线收入标准;文化程度方面,主要以小学及以下水平为主,占样本量的79.66%,表明受访农户受教育程度偏低;从常年外出务工人员数来看,40.61%的受访家庭中至少有1人外出务工,说明在家务农的受访户略多。

2.3 结果分析

2.3.1 相对贫困测度

(1) 相对贫困指数

根据相对贫困测度模型,计算了研究区抽样农

表2 抽样农户基本特征

Tab.2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surveyed farming households

变量	总体/户	脱贫户		非贫困户		
		户数	占比/%	户数	占比/%	
农户属性	1785	861	48.24	924	51.76	
性别	男	1452	700	48.21	752	51.79
	女	333	161	48.35	172	51.65
年龄	≤18岁	11	2	18.18	9	81.82
	19~30岁	31	11	35.48	20	64.52
	31~50岁	306	171	55.88	135	44.12
	51~60岁	329	183	55.62	146	44.38
	≥61岁	1108	494	44.58	614	55.42
家庭人均年纯收入	≤3500元	1	0	0	1	100.00
	3501~5000元	451	167	37.03	284	62.97
	5001~10000元	620	251	40.48	369	59.52
	≥10000元	713	443	62.13	270	37.87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1422	675	47.47	747	52.53
	初中	324	168	51.85	156	48.15
	高中	33	13	39.39	20	60.61
	大专及以上	6	5	83.33	1	16.67
务工人员数	0人	1060	454	42.83	606	57.17
	1人	496	287	57.86	209	42.14
	2人	185	106	57.30	79	42.70
	≥3人	44	14	31.82	30	68.18

表3 研究区相对贫困测度的描述性统计
Tab.3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relative poverty measure in the study area

维度	最大值	上四分位	中位数	下四分位	最小值	平均值	标准差	变异系数
物质资源	0.795	0.179	0.103	0	0	0.128	0.151	1.178
经济条件	1.000	0.912	0.718	0.635	0	0.727	0.198	0.272
可行能力	0.933	0.627	0.514	0.443	0.175	0.529	0.126	0.239
发展机会	1.000	0.819	0.732	0.606	0.130	0.707	0.148	0.209
社会保障	0.828	0.172	0.086	0.086	0	0.152	0.147	0.970
相对贫困指数	0.774	0.551	0.482	0.419	0.232	0.483	0.092	0.190

户的相对贫困指数,其值越小表征相对贫困程度越深。总体来看(表3),研究区的相对贫困指数介于0.232~0.774之间。其中,物质资源、经济条件和社会保障的相对贫困程度较深,指数最低值均为0,是影响相对贫困的重要因素;可行能力和发展机会指数最低值分别为0.175、0.130,其最高值分别为0.933、1.000,说明研究区抽样农户在可行能力和发展机会方面相对贫困程度相对较低。

同时,为了进一步消除指标数据量纲和尺度的影响,本文计算了各类指标的变异系数。由表3可知,各类指数均表现不同程度的异质性,离散程度从大到小依次是物质资源、社会保障、经济条件、可行能力、发展机会。

(2) 核密度估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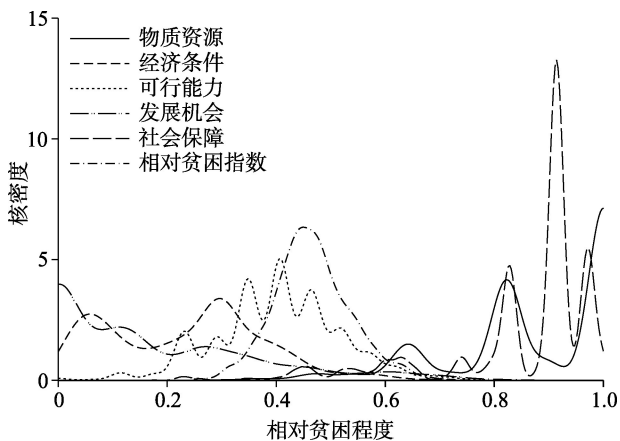
本文采用Kernel核密度估计方法对研究区抽样农户的相对贫困指数分布情况进行了展示,并绘制了相对贫困核密度估计图(图3)。5个单维度和1个多维度的分布曲线形态迥异,其中,相对贫困指数和可行能力指数分布曲线形态大致呈正态分布特征,可行能力指数曲线比相对贫困指数曲线的波峰更加

陡峭,并出现了多个波峰,表明可行能力指数更集中且起伏较大;物质资源指数和社会保障指数曲线分布呈现左偏态分布,且有反复波动的波峰出现,其中物质资源指数出现3个比较大的波峰,表明其指数主要分布在3个等级内,社会保障指数主要分布在3个波峰内,且社会保障指数曲线更加陡峭,表明其相对贫困程度更低;发展机会指数和经济条件指数的分布曲线大致呈右偏态分布,且拖尾较长,说明研究区的发展机会指数和经济条件指数出现两极分化状态,大部分集中在较低水平中,表明发展机会和经济条件处于低水平的指数较多,其相对贫困程度更深,这与前文的研究结果较为吻合。

(3) 相对贫困线划定

按照前文对相对贫困线的界定,以相对贫困指数中位数的70%作为研究区的相对贫困线。测算结果显示,长寿区2018年的相对贫困线为0.323。从抽样农户来看,1785户样本中共有178户农户处于相对贫困状态,占总样本量的9.97%,即相对贫困发生率为9.97%。若按照单一收入划定相对贫困线,研究区2018年的相对贫困线为5950元,共有591户农户处于相对贫困状态,相对贫困发生率为33.10%,其标准明显高于浙江、广东等地区(4000~5000元),这与研究区的实情差距较大,且不符合后2020时期发展目标。因此,基于多维贫困测算相对贫困指数更具有合理的科学性和科学性。

从178户相对贫困户的特征来看:① 相对贫困户具备一定的物质资源,大部分能够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与一般农户差距不大;② 相对贫困户产业发展较差,收入稳定性不强,其中仅20户表明其产业发展效果明显,37.08%的相对贫困户转移性收入占比超过了总收入的50%;③ 相对贫困户参与合作社发展和技能培训的机会较少,178户中仅有1户参与合作社生产经营,3户参加劳动技能培训;④ 相对贫困户受教育程度较低,93.26%的农户户



注:采用高斯核。

图3 相对贫困核密度估计

Fig.3 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 of relative poverty

主教育程度为小学及以下,且获得政策性贷款支持的农户较少(12户);⑤身体状况较差,劳动力数量较少,其中有69户为老人户、残疾户、重病户等无劳动力户。总体来看,相对贫困户实现全面发展较为困难,其产业发展、劳动技能培训、金融服务和教育水平等相对剥夺较为严重。

2.3.2 相对贫困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以研究区178户相对贫困户为对象,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结合上文分析的相对贫困户特点,从自然、社会和经济3个角度选取了平均高程(X_1)、人均耕地面积(X_2)、交通条件(X_3)、农户类型(X_4)、无劳动力占比(X_5)、生产性收入(X_6)、务工性收入(X_7)和医疗负担(X_8)8个指标,进一步探讨影响相对贫困户的因素。相关指标具体操作如下:平均高程、人均耕地面积、生产性收入和务工性收入取具体数值;农户类型中一般户赋值4,脱贫户赋值3,低保户赋值2,特困供养户赋值1;交通条件中农户认为交通方便赋值3,认为比较方便赋值2,认为不方便赋值1;无劳动力占比为无劳动力人数与户籍总人数的比值;医疗负担是医疗费用自付部分与户籍纯收入的比值。

结果显示,多元线性回归方程的拟合优度 R^2 为0.364,通过了显著性 F 检验。在 t 检验中,平均高程和人均耕地面积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其余指标均在不同水平中显著。从表征指标效应的线性回归标准化系数来看(表4),按照变量对相对贫困的影响程度排序,依次是务工性收入、交通条件、生产性收入、医疗负担、无劳动力占比和农户类型,其中务工性收入、交通条件和生产性收入与相对贫困指数呈负相关,医疗负担、无劳动力占比和农户类型与相对贫困指数呈正相关。

3 相对贫困形成机理分析

结合前文相对贫困影响因素分析结果,本文以宏观角度从区域政策、经济因素、社会因素和个人因素等4个方面探索相对贫困形成的机理(图4),期为建立解决农村相对贫困长效机制提供理论参考。

3.1 区域政策是形成相对贫困的外因

精准扶贫以来,研究区贫困村与非贫困村、贫困户与非贫困户获取的政策支持差距较大,区域政策不平衡性导致处于地理位置偏远、交通条件落后的农户生产和生活不便,陷入相对贫困的风险较高,其中43.82%的受访相对贫困户(78户)认为交通条件落后,是影响相对贫困的重要因素。总体而言,中国城乡二元体制和城市优先发展战略,影响了城乡一体化扶贫体系的形成,城乡分治的二元扶贫模式现象突出,城乡人口享受扶贫政策内容、数量和质量存在一定差异。同时,扶贫政策的差异性又促使劣势地区(农村)的劳动力、资本、土地等发展要素向优势区域(城市)集聚,从而形成“贫困陷阱”,导致农村“三留守”人口增多、人口老龄化严重和农村“空心化”等“乡村病”日益严峻。这种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的现象使得处于“贫困陷阱”中的农户发展机会相对较少,创业就业难、融资难等现象突出,是影响相对贫困形成的外因。

3.2 经济因素是形成相对贫困的关键

脱贫攻坚以来,为了解决贫困人口的绝对贫困问题,实现“两不愁、三保障”的基本目标,研究区政府整合资金,加大对贫困地区资金投入,针对无生产能力的残疾户、重病户等采取政策兜底脱贫,实现收入过线,但收入总体水平不高,相对贫困户的

表4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运行结果

Tab.4 Results of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model

自变量	标准系数	t 值	Sig.	VIF
平均高程(X_1)	-0.039	-0.612	0.542	1.054
人均耕地面积(X_2)	-0.078	-1.242	0.216	1.057
交通条件(X_3)	-0.234***	-3.513	0.001	1.182
农户类型(X_4)	0.117*	1.716	0.088	1.224
无劳动力占比(X_5)	0.142**	2.086	0.038	1.231
生产性收入(X_6)	-0.210***	-3.185	0.002	1.154
务工性收入(X_7)	-0.283***	-4.404	0	1.095
医疗负担(X_8)	0.160**	2.286	0.023	1.301

注:***、**、*分别表示变量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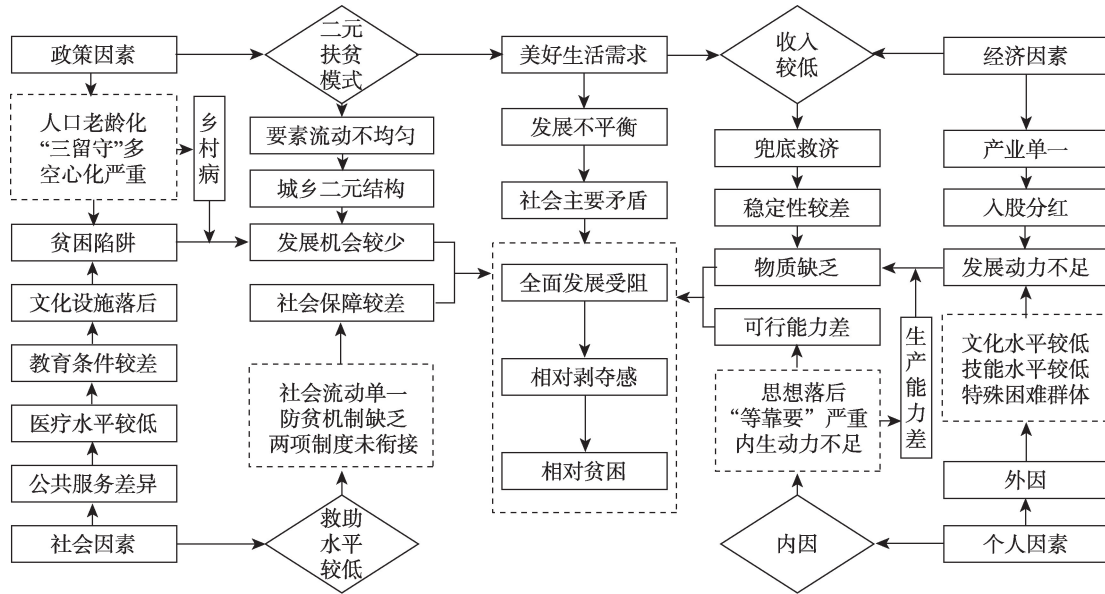


图4 相对贫困机理分析
Fig.4 Mechanism of relative poverty

生产性收入、务工性收入仅为非相对贫困户的64.11%、72.58%，且稳定性不强，抗风险能力较差，返贫脆弱性较强，导致这类特殊困难群众处于相对贫困状态。同时，部分深度贫困村的集体经济发展缓慢，虽然各级政府大力帮扶，投入资金改善生产条件，积极发展产业，但未能形成规模化效应，同质化较为严重，且产业帮扶以简单入股分红为主，178户相对贫困户中有102户享受了简单分红，但有95户(93.14%)未真正参加生产经营活动，这不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贫困人口收入持续性的问题，更是滋生了个别群众“等靠要”思想。因此，经济因素是影响相对贫困人口实现全面发展的重要推力。

3.3 社会因素是形成相对贫困的推力

研究区相对贫困户中，医疗负担是处于相对贫困的重要因素，医疗费用自付部分占总收入的8.42%，远远高于非相对贫困户(3.96%)。总体而言，相对贫困地区的返贫保险机制、政策救助和社会救助机制、大病慢病护理机制等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政府、社会和公益人士“单打独斗”，未能形成合力。同时，精细化救助服务水平较低，以简单的“输血”为主，社会服务供给与相对贫困家庭的需求不匹配，是导致相对贫困形成的重要因素。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较低，相对贫困地区的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导致其医疗水平、教育资源和文化设施等相对落后，相对贫困人口公平享受发展成果的机会较少，导致其陷入相对贫困陷阱，难以实现

全面发展。

3.4 个人因素是形成相对贫困的内因

生产能力和发展动力是相对贫困人口致贫的根本性原因。研究区相对贫困户中特困供养户和低保户的农户类型占总量的32.58%，无劳动力户占比10.11%(远高于非相对贫困户的3.48%)，个人因素是形成相对贫困的主要内因。总之，贫困人口自身条件较差，思想素质相对落后，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欠缺，政府式帮扶助长了个别贫困人口的“等靠要”思想，导致农户自我发展的意识较弱，内生动力不足，生产能力较差；同时，思想文化教育和各类技能培训成效不明显，贫困人口劳动技能水平较低、文化程度不高，其发展能力不强，尤其是空巢老人、精神障碍患者和残疾人等特殊困难群体，不具备生产和发展能力，加之低保线和相对贫困线未能实现合一，导致其处于相对贫困状态。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本文旨在梳理和界定后2020时期相对贫困的新内涵和新特点，构建农户相对贫困测度评价指标体系，探索性地界定相对贫困线，并以重庆市长寿区为例进行实证分析，进一步探讨相对贫困形成的机理。主要结论如下：

(1) 相对贫困指数法具有一定的科学性。本文

全面梳理和总结了相对贫困线划定的方法,以收入作为相对贫困线界定标准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不能精准识别相对贫困人口。与此同时,相对贫困指数法基于多维贫困的视角,能够全面反映或量化人口实际生活状况的需求,包括物质、发展、能力、社会保障等方面,实证分析说明了相对贫困指数法比单一收入法界定的相对贫困线更符合实际情况。同时,相对贫困指数法以1 a为周期,及时更新相对贫困线,对精准识别相对贫困人口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科学性。

(2) 相对贫困人口获得全面发展的机会相对较少。研究表明,研究区相对贫困的可行能力和发展机会的相对贫困指数较小,贫困程度较深。从相对贫困特征来看,主要是因为产业带动作用较弱,参与合作社发展和劳动技能培训的机会较少,户主教育水平较低,且超过1/3的相对贫困户属于老人户、残疾户和重病户。因此,相对贫困人口提高生活质量、提升自身能力和获得发展的机会较少,目前实现全面发展存在一定的瓶颈。

(3) 扶贫政策、经济基础、社会保障和个人条件是影响相对贫困的重要因素。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和二元扶贫模式,导致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形成了“贫困陷阱”,优势地区剥夺劣势地区的生产要素,劣势地区的贫困人口经济基础较差,尤其是特殊人群,其收入主要依靠国家政策兜底,略高于绝对贫困线,抗风险能力较差。同时,个别群众“等靠要”思想严重,内生动力不足,生产能力和发展动力欠缺,加之中国社会保障体系不够健全,政府、社会和个人未形成合力,劣势地区的人口不能公平享受发展成果,相对剥夺感较强,导致其陷入相对贫困状态。

4.2 讨论

到2020年末,中国将历史性地摆脱绝对贫困,创造人类减贫史的奇迹。同时,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加之中国幅员辽阔,城乡发展不均,社会内部存在较大差距,后2020时期相对贫困将逐渐凸显,中国农村扶贫工作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因此,本文尝试性地探讨相对贫困问题,构建相对贫困体系,运用相对贫困指数法界定相对贫困线,为建立解决农村相对贫困长效机制提供理论参考。但本文仍具有许多不足之处:① 相对贫困指数法可操作性有待提高。虽然全面考虑了人的发展所需,但各个指标的量化较为困难,实际操作需进

一步提高其便捷度。② 相对贫困体系未能详细阐述。由于篇幅的限制,本文仅构建了评价体系 and 界定方法,没有系统性地分析相对贫困体系,其治理方向还处于探索阶段。③ 相对贫困实践研究和多尺度的研究较少,这将为后期的研究指明方向。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1] 汪三贵,殷浩栋,王瑜. 中国扶贫开发的实践、挑战与政策展望 [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4): 18-25, 189. [Wang Sangui, Yin Haodong, Wang Yu. The policy practice, challenge and prospect of China's poverty alleviation. Journal of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17(4): 18-25, 189.]
- [2] 邓金钱,李雪娇.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扶贫开发实践与理论创新研究 [J]. 经济学家, 2019(2): 47-54. [Deng Jinqian, Li Xuejiao. Research on China's poverty alleviation practice and theoretical innovation in the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Economist, 2019(2): 47-54.]
- [3] 黄承伟. 我国新时代脱贫攻坚阶段性成果及其前景展望 [J]. 江西财经大学学报, 2019(1): 55-62. [Huang Chengwei. China's staged achievement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in the new era and its prospects. Journal of 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2019(1): 55-62.]
- [4] 蔡兴冉,梁彦庆,黄志英,等. 河北省县域相对贫困度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分析 [J]. 西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9, 41(10): 62-71. [Cai Xingran, Liang Yanqing, Huang Zhiying, et al. Analysis of relative poverty degree of the counties of Hebei Province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Journal of Southwest University, 2019, 41(10): 62-71.]
- [5] 刘彦随,李进涛. 中国县域农村贫困化分异机制的地理探测与优化决策 [J]. 地理学报, 2017, 72(1): 161-173. [Liu Yansui, Li Jintao. Geographic detection and optimizing decision of the differentiation mechanism of rural poverty in China.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7, 72(1): 161-173.]
- [6] 刘愿理,廖和平,张茜茜,等. 西南喀斯特区贫困空间剥夺的识别及空间格局分析 [J]. 农业工程学报, 2019, 35(15): 284-294. [Liu Yuanli, Liao Heping, Zhang Qianqian, et al. Identification and spatial pattern analysis of poverty spatial deprivation in karst region of Southwest China. Transactions of the CSAE, 2019, 35(15): 284-294.]
- [7] 何仁伟,方方,刘运伟. 贫困山区农户人力资本对生计策略的影响研究:以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为例 [J]. 地理科学进展, 2019, 38(9): 1282-1893. [He Renwei, Fang Fang, Liu Yunwei. Influence of human capital on the livelihood strategy of farming households in poor mountainous areas: A case study of Liangshan Yi Autonomous Pre-

- fecture of Sichuan, China.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9, 38(9): 1282-1893.]
- [8] 马历, 龙花楼, 屠爽爽, 等. 基于乡村多功能理论的贫困村域演变特征与振兴路径探讨: 以海南省什寒村为例 [J]. *地理科学进展*, 2019, 38(9): 1435-1446. [Ma Li, Long Hualou, Tu Shuangshuang, et al. Characteristics of change and vitalization pathways of poor villages based on multifunctional rural development theory: A case study of Zahan Village in Hainan Province.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9, 38(9): 1435-1446.]
- [9] 吴国宝. 改革开放40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的成就及经验 [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18(6): 17-30. [Wu Guobao. Achievements and experiences in China's rural poverty relief and development over the past 40 reform and opening-up years. *Journal of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8, 18(6): 17-30.]
- [10] 魏后凯. 2020年后中国减贫的新战略 [J]. *中州学刊*, 2018(9): 36-42. [Wei Houkai. The new strategy for China's poverty alleviation after 2020. *Academic Journal of Zhongzhou*, 2018(9): 36-42.]
- [11] 张琦. 减贫战略方向与新型扶贫治理体系建构 [J]. *改革*, 2016(8): 77-80. [Zhang Qi. A preliminary study on post-2020 poverty reduction strateg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poverty alleviation system. *Reform*, 2016 (8): 77-80.]
- [12] 李小云, 许汉泽. 2020年后扶贫工作的若干思考 [J].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18(1): 62-66. [Li Xiaoyun, Xu Hanze. Several thoughts on the poverty issue after 2020. *Journal of Chinese Academy of Governance*, 2018(1): 62-66.]
- [13] 罗静, 蒋亮, 罗名海, 等. 武汉市新城区乡村发展水平评价及规模等级结构研究 [J]. *地理科学进展*, 2019, 38 (9): 1370-1381. [Luo Jing, Jiang Liang, Luo Minghai, et al. Rural development level of villages in Wuhan City's new urban districts and its hierarchical structure.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9, 38(9): 1370-1381.]
- [14] 汪三贵, 曾小溪. 后2020贫困问题初探 [J].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20(2): 7-13, 89. [Wang Sangui, Zeng Xiaoxi. Preliminary study on post-2020 poverty. *Journal of Hohai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2018, 20(2): 7-13, 89.]
- [15] 白永秀, 刘盼.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我国城乡反贫困的特点、难点与重点 [J]. *改革*, 2019(5): 29-37. [Bai Yongxiu, Liu Pan. The characteristics, difficulties and key points of China's urban and rural anti-poverty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a well-off society. *Reform*, 2019(5): 29-37.]
- [16] Katikireddi S V, Dundas R. Relative poverty still matters [J]. *Lancet Public Health*, 2017(2): 126-127.
- [17] Duarte R, Ferrando-Latorre S, Molina J A. How to escape poverty through education? Intergenerational evidence in Spain [J]. *Applied Economics Letters*, 2018, 25: 624-627.
- [18] 何秀荣. 改革40年的农村反贫困认识与后脱贫战略前瞻 [J]. *农村经济*, 2018(11): 1-8. [He Xiurong. The understanding of rural anti-poverty in 40 years of reform and the outlook of post-poverty alleviation strategy. *Rural Economy*, 2018(11): 1-8.]
- [19] 高强, 刘同山, 沈贵银. 2020年后中国的减贫战略思路与政策转型 [J]. *中州学刊*, 2019(5): 31-36. [Gao Qiang, Liu Tongshan, Shen Guiyin. China's poverty reduction strategy and policy transformation after 2020. *Academic Journal of Zhongzhou*, 2019(5): 31-36.]
- [20] Cheng X, Shuai C M, Wang J. Building a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odel for China's poverty-stricken reservoir regions based on system dynamics [J].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2018, 176: 535-554.
- [21] 周扬, 郭远智, 刘彦随. 中国县域贫困综合测度及2020年后减贫瞄准 [J]. *地理学报*, 2018, 73(8): 86-101. [Zhou Yang, Guo Yuanzhi, Liu Yansui. Comprehensive measurement of county poverty and anti-poverty targeting after 2020 in China.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8, 73(8): 86-101.]
- [22] 何家军, 朱乾宇. 三峡农村移民相对贫困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基于湖北库区的调查 [J]. *调研世界*, 2016(10): 23-27. [He Jiajun, Zhu Qianyu.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relative poverty factors of rural migration in the three gorges area: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reservoir area in Hubei Province. *The World of Survey and Research*, 2016(10): 23-27.]
- [23] Townsend P. *Poverty in the United Kingdom: A survey of household resources and standards of living* [M]. Oakland, US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9.
- [24] 陈志钢, 毕洁颖, 吴国宝, 等. 中国扶贫现状与演进以及2020年后的扶贫愿景和战略重点 [J]. *中国农村经济*, 2019(1): 1-15. [Chen Zhigang, Bi Jieying, Wu Guobao, et al. Post-2020 rural urban integrative poverty reduction strategy: Development status, evolution, new vision and key areas. *Chinese Rural Economy*, 2019(1): 1-15.]
- [25] 陈梦根. 贫困购买力平价和地区贫困线: 理论与测算 [J]. *改革*, 2019(4): 88-102. [Chen Menggen. Poverty PPP and regional poverty lines: Theory and measurement. *Reform*, 2019(4): 88-102.]

- [26] 陈宗胜, 沈扬扬, 周云波. 中国农村贫困状况的绝对与相对变动: 兼论相对贫困线的设定 [J]. 管理世界, 2013(1): 67-77, 187-188. [Chen Zongshegn, Shen Yangyang, Zhou Yunbo. On the absolute and relative changes in the poverty in China's village and on the setting of the relative poverty line. Management of the world, 2013(1): 67-77, 187-188.]
- [27] Albeherly N, Albeherly N, Hassan E. Robust estimator for relative poverty line with application to Egypt [J]. Advances and Applications in Statistics, 2018, 53: 379-400.
- [28] Ravallion M, Chen S H. Global poverty measurement when relative income matters [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19, 117: 1-13.
- [29] 莫光辉, 杨敏. 2020年后中国减贫前瞻: 精准扶贫实践与研究转向 [J]. 河南社会科学, 2019, 27(6): 99-107. [Mo Guanghui, Yang Min. Reduction prospect after 2020: Practice and research turn of precision poverty alleviation: A series of prospective explorations on poverty reduction and development in China after 2020. Henan Social Sciences, 2019, 27(6): 99-107.]
- [30] 白增博, 孙庆刚, 王芳. 美国贫困救助政策对中国反贫困的启示: 兼论2020年后中国扶贫工作 [J]. 世界农业, 2017(12): 105-111. [Bai Zengbo, Sun Qinggang, Wang Fang. Enlightenment of us poverty relief policy on China's anti-poverty: Also on China's poverty alleviation work after 2020. World Agriculture, 2017(12): 105-111.]
- [31] 黄征学, 高国力, 滕飞, 等. 中国长期减贫, 路在何方? 2020年脱贫攻坚完成后的减贫战略前瞻 [J]. 中国农村经济, 2019(9): 1-13. [Huang Zhengxue, Gao Guoli, Teng Fei, et al. Where is the way for China to reduce poverty for a long time? Prospects for poverty reduction strategies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poverty alleviation in 2020. Chinese Rural Economy, 2019(9): 1-13.]
- [32] 苏江丽. 欧盟监测低收入和社会排斥指标介评 [J]. 理论探索, 2007(5): 138-141. [Su Jiangli. The EU monitors the evaluation of indicators of low income and social exclusion.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2007(5): 138-141.]
- [33] 孙久文, 夏添. 中国扶贫战略与2020年后相对贫困线划定: 基于理论、政策和数据的分析 [J]. 中国农村经济, 2019(10): 97-113. [Sun Jiuwen, Xia Tian. China's poverty alleviation strategy and the delineation of the relative poverty line after 2020: An analysis based on theory, policy and empirical data. Chinese Rural Economy, 2019(10): 97-113.]
- [34] Booyesen F, van der Berg S, Burger R, et al. Using an asset index to assess trends in poverty in seven Sub-saharan African countries [J]. World Development, 2008, 36: 1113-1130.
- [35] 蔡进, 禹洋春, 骆东奇, 等. 重庆市农村多维贫困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分析 [J]. 农业工程学报, 2018, 34(22): 235-245. [Cai Jin, Yu Yangchun, Luo Dongqi, et al. Space differentiation and its influence factor analysis of rural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 Chongqing. Transactions of the CSAE, 2018, 34(22): 235-245.]
- [36] 陈佳, 张丽琼, 杨新军, 等. 乡村旅游开发对农户生计和社区旅游效应的影响: 旅游开发模式视角的案例实证 [J]. 地理研究, 2017, 36(9): 1709-1724. [Chen Jia, Zhang Liqiong, Yang Xinjun, et al. The impact of tourism development on changes of households' livelihood and community tourism effect: A case study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tourism development mode.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7, 36(9): 1709-1724.]

Measurement and mechanism analysis of relative poverty of farming households in the post-2020 period: A case study of Changshou District, Chongqing Municipality

LIU Yuanli¹, LIAO Heping^{1,2*}, LI Jing³, LI Tao¹, CAI Jin⁴, HE Tian¹

(1. Schoo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2. Southwest University Center for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Assessment, Chongqing 400715, China;

3.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ianyang 621000, Sichuan, China;

4. College of Tourism and Land Resource, 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67, China)

Abstract: Absolute poverty will be completely eliminated in China in 2020. However, due to the imbalance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the differentiation of basic public services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the lack of robust internal motivations in some special groups of people, relative poverty will become a long-lasting problem and a key factor hindering social and economic progress and social stability. Therefore, the study of China's relative poverty will provide a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a long-term mechanism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relative poverty in rural China in the post-2020 period. Taking farming household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2018 as the time frame of the research, this study systematically analyzed the conno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relative poverty in the post-2020 period and built a measurement and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relative poverty. It also defined the relative poverty line based on a multidimensional perspective and conducted an empirical analysis with Changshou District of Chongqing Municipality as an example. The research generated the following results: 1) The relative poverty index is a useful measure that defines the relative poverty line from a multidimensional perspective of materials, development, ability, and social security. The empirical analysis demonstrates that the relative poverty index is more in line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than the single income method in defining the relative poverty line and it can fully meet the needs of reflecting or quantifying actual living conditions of people. 2) Because of the weak support from industry, less opportunities to participate in the cooperative development and skill training of labors, lower level of education, and the fact that more than a third of the relatively poor households are elderly, disabled and seriously ill persons, the relative poverty population are less likely to improve their quality of life, strengthen their capacities, and have access to development. 3)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ies, economic foundations, social security, and personal conditions are important factors affecting relative poverty. Among them, regional policies are the external causes of relative poverty, economic factors are the key to stimulate the formation of relative poverty, social factors are the basic impetus to prevent the formation of relative poverty, and personal factors are the internal cause of relative poverty.

Keywords: relative poverty; mechanism analysis; farming households; measurement; post-2020 period; Chongqing Municipality